

黔山蕴风骨 吴水续文脉

——记文化守护者谢孝思

赵宇飞

谢孝思。图源网络

在黔山贵水与江南烟雨之间，有一个人把他一生中最深沉的眷恋与最执着的守护，献给了千里之外的苏州，在贵州与苏州之间，架起了一座文化的“桥梁”。他叫谢孝思，贵州贵阳人。

2014年，国际小行星中心将第204836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“谢孝思星”，以褒扬其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卓越成就。

今天，当我们谈论长三角一体化、区域协调发展、文化传承与创新时，谢孝思先生的身影穿越时空，向我们走来，带着贵州山地的坚韧，也带着江南水乡的温润。

从黔山到水乡

1905年，谢孝思出生于贵州贵阳。那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原，赋予了他独特基因——质朴、坚毅、对故土的深情。贵州的山，不似江南的秀丽，却有一种沉默的力量；贵州的水，不似太湖的浩渺，却有一种奔涌的执着。这种地域性格，贯穿了谢孝思的一生。

青年时代，谢孝思走出大山，求学于南京，后定居苏州。从黔中到江南，从山地文明到水乡文明。在两种地域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，锻造出他独特的人格气质——既有贵州人的刚直与担当，又有苏州人的细腻与包容。

在苏州，他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，桃李满天下。但他不仅仅是一位教育家。也是一位文化的守护者。当战火与动荡席卷而来，当古老的文化遗产面临毁灭的危险，谢孝思站了出来，挽起袖子、踏遍街巷，用双脚丈量苏州的每一处园林、每一座古桥、每一条老街，用双手记录、整理、保护那些或将消逝的文化记忆。

这种人格风范，在今天看来尤为珍贵。我们生活的时代，不缺聪明人，不缺善于表达的人，缺的是像谢孝思这样“知行合一”的人——他们不说漂亮话，只做实在事；他们不追求聚光灯下的荣耀，只在意文化血脉的延续。

守护园林古城

谢孝思对苏州的贡献，怎么估量都不为过。

20世纪中叶，苏州的古典园林、历史街区在时代变迁中面临严峻挑战。许多园林荒废，许多文物散佚，许多传统技艺濒临失传。谢孝思与一批有识之士一起，奔走呼号，推动了对苏州园林的系统性保护与修复。拙政园、留园、网师园……这些今天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园林，背后都有谢孝思的担当和心血。

他深知，文化保护不仅仅是修几座园子、保护几件文物。文化是活着的，它活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里，活在城市的肌理中。因此，他积极推动苏州古城整体保护，主张“修旧如旧”，反对大拆大建。在今天，这种理念早已成为共识，但在当时，需要极大的远见与勇气。

他还是一位艺术家与学者。他的书画，既有贵州山水的雄浑，又有江南文人的雅致；他的诗文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故园乡愁。他用艺术家的敏感、教育家的责任、学者的严谨，为苏州文化事业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谢孝思的历史贡献，不仅是具体的保护成果，更是一种文化态度的确立——文化不是发展的包袱，而是发展的根脉；保护不是守旧，而是为了更自信地走向未来。

文化价值再发现

谢孝思的文化意义，需要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中理解。

首先，他是文化自觉的先行者。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，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。谢孝思早在20世纪中叶，就以自己的实践诠释了这一理念。他深知苏州文化的价值，不仅因为它古老，更是因为它蕴含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追求——那种天人合一的哲学，那种诗画交融的审美，那种精致而不奢华的生活态度。这种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，在我们面对全球化浪潮、文化同质化挑战的今天尤显重要，唯有自觉，才能自信；唯有自信，才能自强。

其次，他是跨地域文化交流的典范。谢孝思的一生，是贵州与苏州两地文化深度交流的缩影。他把贵州人的坚韧带到了苏州，也把苏州的精致带回了贵州。他晚年多次回到贵州，推动两地文化合作，促成了许多文化交流项目。在他看来，地域文化不是封闭的孤岛，而是流动的河流。贵州的山与苏州的水，看似迥异，实则相通——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。

再次，他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化身。谢孝思不是书斋里的学者，他始终关注现实、介入现实、改变现实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，知识分子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创造知识，更在于用知识服务社会、守护文明。这种担当精神，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。

文化保护需要“在场”的姿态

今天，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键时期。城市化进程加速，许多历史街区面临改造压力；全球化深入，许多地方文化面临弱化和消失风险；数字化浪潮席卷，许多传统技艺面临传承困境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谢孝思的文化实践和人文精神愈发显得珍贵。

他告诉我们，文化保护需要躬身入局。谢孝思是亲自走进每一座园林、每一条老街，与工匠交谈，与居民沟通。这种“在场”的姿态提醒我们：文化保护不是抽象的理念，而是具体的行动；不是少数人的事业，而是全社会的责任。

文化传承需要创造性转化。谢孝思保护苏州园林，不是把它们变成僵化的博物馆，而是让它们继续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。他推动传统工艺的传承，不是简单地复制过去，而是鼓励创新。这种活态传承的理念，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坚持的方向。

文化交流需要双向奔赴。贵州与苏州，一个是西部高原，一个是东部水乡，看似遥远，却因为谢孝思而紧密相连。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今天，在东西部协作深化的今天，这种跨越地域的文化交流，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。他提醒我们：发展不仅是经济的互补，更是文化的互鉴；不仅是情感的联结，更是资源的流动。

两地续写文化交流新篇章

谢孝思先生留给我们的，不仅是精神遗产，更是实践路径。

今天，贵州与苏州的文化交流正在翻开新的篇章。在苏州，有贵州籍艺术家举办的展览，有贵州非遗项目的展示，有贵州文化爱好者的雅集；在贵州，有苏州园林艺术的借鉴，有苏州工匠精神的传播，有苏州文化机构的合作。这种交流，不再是单向的“输出”或“输入”，而是双向的“对话”与“共创”。

文化不是古董，而是活的传统；传统不是负担，而是创新的源泉；地域不是界限，而是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的空间。

文化不是发展的代价，而是发展的灵魂；保护不是守旧，而是为了更有底气地走向未来。

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：谢孝思。一个贵州人，一个苏州人，一个中国人，一个文化守护者。

世界最长的年节 谷熟庆典的欢呼

——贵州民族大学研究员潘朝霖谈水族端节的秋收叙事

本报记者 曹雯

贵州人依山就势，在群山间孕育出“大节三六九，小节天天有”的节庆文化。作为“千节之省”的贵州，在秋季迎来了民俗节庆密度最高的季节，秋收之后，各族年节扎堆登场。

这个季节，世界上最长的年节——水族端节正在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、都匀市以及黔东南州丹寨县等地分批进行，52天的节庆跨越整个秋季，40余座端坡上万马奔腾。

记者专访了贵州民族大学研究员、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潘朝霖，解读端节背后的文化与民俗密码。

记者：秋季是贵州大型民俗节庆集中的时段，水族端节凭借分批次轮流过节的形式，是贵州境内时间跨度最长的民族节庆，被誉为世界最长的年节。请问水族端节与秋收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？

潘朝霖：这个联系非常紧密。水族有自己的历法，一年分夏冬两季，上下半年的分界点分别是春分和秋分。水族预祝谷物丰收的四批卯节、庆贺谷物丰收的七批端节，就是依据水历形成的悠久的农耕文化。每年谷物成熟、桂花飘香的水历年底十二月（对应农历八月）至新年正月的52天时间段，是水族群众盛大的年节端节，家家户户庆贺丰收，辞旧迎新，祭祀神灵，聚会亲友。由此观之，水族端节本就是悠久的农民丰收节。


贵州民族大学研究员、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潘朝霖。受访者供图

记者：水族端节如何诠释汉字“年”的本义？

潘朝霖：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年，谷熟也，从千，千声。”《尔雅·释天》训释：“夏曰岁，商曰祀，周曰年，唐虞曰载。”注疏称为：“年者，禾熟之名，每岁一熟，故以为岁。”“谷熟庆典曰过年”是漫长农耕社会民间的最大庆典。“年”甲骨文、金文的字形，就是人躬身背负谷穗的象形。因“年”与谷物成熟有关，所以《谷梁传》云：“五谷皆熟为有年，五谷皆大熟为大有年。”

但在现代汉语中，“年，谷熟也”的本义早已湮没，汉族春节的时令不是谷熟季节，庆贺内涵不是谷物丰收。但在水族历法与端节中，依旧可以找到对汉字“年”本义的诠释。水族群众把岁首放在谷熟时节，通过端节让丰收的喜悦在村寨间依次传递。

记者：端节在水语中称为“借端”，“借”是吃，“端”是岁首、新年。这个“吃年”的内涵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潘朝霖：端节的核心内涵就是辞旧迎新、庆贺丰收、祭祀祖先、款待亲友。水族过端节祭祖，禁食禽畜兽类油肉，以鱼为主祭品。水族崇尚鱼祭，既源于图腾崇拜信仰，又与生育崇拜及生活所需有关。古代用鱼祭祖很神圣，称为“鱼牲”或“牲鱼”。《周礼·夏官·大司马》载：“大祭祀飨食，羞牲鱼，授其祭。”汉代郑玄注曰：“牲鱼，鱼牲也。”由于年节祭祀不能缺鱼，衍生出岁岁有余（鱼）的成语。韭菜也是祭典名菜，《诗经》中多有用韭菜祭祖记载。河南睢县的名菜糟鱼，制作方式与鱼包韭菜相似，只是以大葱填充鱼腹，通常要文火慢炖五六个钟头出锅。水族先民从睢水流域南迁融入百越族群，鱼包韭菜或许活态传承着远古的一些文化信息。

记者：今年端节期间，贵州“村马”的赛事安排是怎样的？从端节传统赛马到贵州“村马”，您有什么期待？

潘朝霖：今年端节从9月21日开始，分七批至11月10日结束，历时52天。村级传统赛马在40余座端坡举行，在三都县城依据现代赛马规则举行贵州村马邀请赛，交替穿插进行。

端节一定要举行赛马活动，水族地区传统赛马的端坡有40余座，其中三都自治县境内有30余座。2023年之后，传统赛马活动与现代国际赛事结合，形成了贵州“村马”。这是贵州“村马”从水族端节民俗仪式的赛马崛起，与现代品牌赛事有机结合，演绎民族传统赛马与当代马术欢乐的交响曲，也是传承传统与时代创新的叠加与重构。

近年来，黔南持续打响文旅名片，包括了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小七孔、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“中国天眼”以及贵州“村马”。这是世界级山水景观与大国重器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合，互补性强，整合成黔南旅游名县铁三角。

记者：您到翁降村调查不下20次，这个村自筹资金建赛马场的故事很感人。端坡对水族人意味着什么？

潘朝霖：端坡是古代部族联盟的标志形象与尊严，赛马是端节的核心活动。都匀市原三个水族乡因多种变故，导致没有一个固定的赛马场。翁降村自古是水族端节的重要基地之一，村民一直要过端节，坚持跑马。当年水书先生韦荣池说：“我们老祖宗过的是端节，节日不能改。跑马是端节的魂，更不能丢。老祖宗过去骑马守疆土，我们要是在盛大年节都不跑马，那就愧对老祖宗了。”

2023年贵州“村马”蹄声激荡，点燃了翁降村民建新端坡的热情，当地村民自发捐款。村民韦杰第一个捐款5000元，带动众人随捐，当晚就收到捐款3万余元。2025年共集资27万多元，2026年又继续捐资20万多元，用于新建官旺端坡。新建的赛马场占地1平方公里多，有500余米赛马场、800多平方米斗牛场、篮球场、对歌台、水书马尾绣非遗文创展示区，是水族地区目前设施完备的一流端坡。今年9月21日端节首日，第一端坡的马铃叮当响起，引动水乡万马萧萧奔腾。


贵州“村马”端坡竞技。受访者供图

花溪苗族挑花：十字针艺绣迁徙与日常

龚莉

2000年前后，十字绣在国内悄然流行，绣着“家和万事兴”的成品装裱在铝合金画框里，挂在不少家庭客厅的显眼处，近年来，十字绣又成为手工爱好者的手作乐趣。这种以布的经纬线为坐标，交叉的点汇聚一起，点阵位图成像技法起源于唐宋时期，又称“挑织”“十字花绣”，属中国传统刺绣技法，同样效果的技法在欧洲叫十字绣。

花溪苗族挑花作为贵州民族民间艺术的重要种类之一，其技法是挑花，原理上和十字绣相似。

据《贵州年鉴（1985）》记载：“贵州苗族妇女除刺绣技艺外，还长于挑花，其中尤以贵阳郊区花溪一带苗族挑花最为著名。”苗族西迁之后，定居在贵阳花溪的苗族支系发现挑花色彩更丰富，表现力也更强，开始在蜡染图案底纹上制作挑花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语言。


色彩艳丽的花溪苗族挑花。图源：贵州省人民政府网

《贵州省志·科学技术志》提到，花溪苗族挑花不用绷子，其特点是“反挑正着”。所用面料为纯手工的家机土布，纹理醒目粗犷，便于数纱挑绣。挑绣针法以十字针和长短针为主。构图基本骨格有井字形、米字形、圆形、方形和菱形等，多为几何纹样，图案多为对称式或团花等。色彩艳丽，色调为粉红色，有浅底深花，深底浅花，前者以白布作底，大红粉红图案为主，配以少数蓝色、黄色点缀，后者用黑布或蓝布作底，白色图案为主，配以大红色、黄色、粉红色及少量绿色、蓝色点缀，色彩鲜明协调，艳而不俗。花溪挑花多从图案中心向外挑绣，其图案组成多为放射式，整个图案方中见圆，花中有花，井井有条，繁而不乱，节奏感强，具有超脱自然的抽象美。

花溪挑花已有500多年的历史。古老的花溪挑花，图案严谨，以鱼刺纹为主。现在的花溪挑花有所创新，挑花图案题材广泛，但仍多用植物纹样，如刺梨花、蝴蝶花、八角花、鸡冠花等，还有动物和人物纹样。构图形式一般采用对称式，形式多样，灵活多变。挑花用色主要白、红、黄、桃红、绿5种颜色，极少杂以其他颜色。

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，苗绣（花溪苗绣）产品现已销往世界许多国家。日本京都服饰研究所所长藤川延子曾说：“苗族刺绣丰富多彩，绚丽夺目，艺术智慧惊人，好像一颗颗蓝宝石，把人间美好的生活都反映到刺绣、挑花的美丽画景之中”。

贵州苗族刺绣和挑花，常被应用在服饰、壁挂、背包等日用生活品中。与装饰墙面的十字绣作品不同，绣娘将历代民族迁徙历程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象物品抽象化，凝结为十字图形构成的图案。这种艺术提炼，伴随着文化传承。它起源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，深深植根于劳动人民的烟火日常，是历史长河中的温柔沉淀。

本版责编：黄蔚 陈曦 姚曼 赵怡 版式设计：侯刚